

陈明:与丁玲风雨相携五十年

□本报记者 钟华

2010年初,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中国现当代剧作家陈明的口述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时,陈明已是93岁的耄耋老人。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讲述了陈明与丁玲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突出了两位老革命文艺工作者对党终生不渝的信念,本书描述了从抗战(延安时期)、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反右蒙冤到“文革”遭遇,以及平反后重新投入工作的曲折生活经历,细节丰富生动。

一部陈明的回忆录,却选择了以丁玲作为主角,陈明是这样说的:“当我开始接受访谈时,我只打算谈谈自己,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参加学生运动,又如何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我的这些经历,对于现在年轻人了解历史,不无裨益。但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丁玲。因为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年华。因此,我的回忆录最后命名为‘我与丁玲五十年’,这里面

也可以为研究丁玲的人提供一些资料。”

一段“倒追”来的爱情

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丁玲的人生经历也是跌宕起伏,充满了波折与磨难,无论是与革命烈士胡也频的短暂婚姻,还是将她陷入噩梦一般生活的丁冯之恋——坊间流传的她与冯雪峰之间的情愫,这些故事更成为人们不胜唏嘘感叹的话题。然而,她人生最后一段恋情,与陈明结合的不被众人看好的“老妻少夫”的婚姻,却长达50年,而且成为她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光里唯一的幸福与慰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是不放心你,你太苦了。”

陈明1937年5月4日到达延安后,加入了文化服务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而西战团的主任正是由丁玲担任。陈明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丁玲的情景:“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和大家一样,我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印象。”尽管在工作中他和丁玲接触较多,感到她平易

近人,但他并没有对丁玲产生特别的感情,也感觉她对自己的关心超出了一般朋友,但一直视她为姐姐。

陈明和丁玲之间,是丁玲主动挑明的关系。资历与年龄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二人的关系,在延安也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性格风风火火的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自然不在乎这些,然而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

最终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里,苦恋了5年的丁玲和陈明终成眷属,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

他是丁玲的守护者

从这间窑洞开始,他们相依相携走过了长达50年的人生。他们一起参加整风审干,参加晋察冀边区土改,在北京改编剧本、拍摄影片,在北大荒建设新家,在“文革”中度过狱中生活,平反后重返北京等,他们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始终矢志不渝。

有学者说,陈明一直扮演了丁玲守护者的角色,一是在丁玲命运多舛的岁月中,不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定价:29.00元

不弃,成为其坚强的后盾;一是在政治上、历史上维护丁玲的名誉,尤其在丁玲1986年去世后,陈明一直是丁玲名誉捍卫者。

在书中,陈明对丁玲的个人历史进行了探讨,揭示和记录了他们的真实人生、精神世界和爱情生活,也从个人的传奇的命运中追索出那个时代的种种复杂人物关系的细枝末节。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是毛泽东对作家丁玲的称赞。陈明在书中回忆到:“1937年初,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丁玲也从前方回到了延安。那时延安的民主气氛很浓。丁玲刚到延安不久,毛主席问了丁玲对延安的印象怎么样,丁玲在主席面前很随便,信口开河开玩笑:我看像个朝朝转。主席也笑着说:好哇,那你给我封官哪。丁玲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做国防大臣,董必武可以做司法大臣。毛主席又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东官、西官呢。丁玲说:那我可不敢封,弄不好贺子珍不跟我打架呀!从延安时期的融洽,到解放

后的渐渐疏远,书中也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此外,对于大家关注的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怨、丁玲与周扬的矛盾,陈明也一一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向读者作了细致的叙述。

一传三递的接力棒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的由来,要从十多年前说起。当时北京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历史文化名人”口述丛书,陈明也被列入名单之内。查振科受一位参与丛书策划的朋友之托,担负起记录、整理陈明口述的任务。

从1998年3月31日到1999年6月16日,主要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查振科带着一部小录音机来到木樨地陈明公寓,听老人讲述他那五味俱全、波澜起伏的一辈子。然而从2000年开始,陈明为了着手出版一套完整的《丁玲全集》,暂时中止了他的口述回忆录工作。2004年底,丁玲百年诞辰活动结束,查振科已经出任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无暇继续这项工作。陈明的晚年老伴张钰拿

起了这个接力棒,这样的工作进行了两年多。2006年秋天,张钰突患食道癌住进医院,而年届九旬的陈明老人也两次患脑出血,住进医院。

陈明、张钰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繁重的文字工作,他们经过商量,物色了新的候选人。2007年的某一天,李向东应约来到木樨地,两位老人告诉他:“这项工作,只能由你来走动了。”李向东与陈明老人走动较勤,关系较密,又曾经与王增如一起编辑撰写了《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陈明爱情书简》等书,对于陈明的历史和经历的那些事件都较为熟悉,是最理想的人选。他毫不犹豫地接过接力棒,这是冲向终点线的最后一棒。就这样,这部稿子前后历时10年,经过查振科、张钰、李向东三个人,齐心协力终于完成。

陈明在北京木樨地公寓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十分欣慰这本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能如此快速出版。93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与记者的谈话也永远围绕丁玲,仿佛她依然在身边一样。

可贵的“追”与“寻”

——读《追寻轨迹》有感

□刘洪海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报高级记者李浩鸣和他的学生邓晓丽共同撰写并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追寻轨迹 1959~2009——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变革求新发展之路》,记述了一个国立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半个世纪走过的发展历程,真实、生动而且深刻,不但让读者通过这部书了解到一个科研机构向大型科技企业集团转型过程中50年起伏跌宕、跨越发展的和她所折射的社会变革,亦值得科技与新闻领域的从业者阅读和思考。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部科研型企业的报告文学吗?图书市场上这样的书籍何其多哉!确实,正如市场上物质供给极大丰富一样,五颜六色的图书让人目不暇接,与企业相关的报告文学如过江之鲫,蹦蹦跳跳地朝读者微笑。但是这部书,让我感觉到极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这部书有一种近年少有的“追”与“寻”。

这部书“追”的是原汁原味的真实。大家都知道大作家徐迟空谷足音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让我们回味无穷。可是瑜不掩瑕的是,与当时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一样,《哥德巴赫猜想》的文学性强而报告性弱。由此衍生出关于这类作品评价标准的激烈争论。不管怎么说,报告文学应该更多地靠近新闻通讯,否则这种文体就难以存在。《追寻轨迹》讲到的其人、其时、其事,桩桩件件皆可考证。书中所举的与事具有严格新闻的几个“W”要素,任何人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按书索骥,追根寻源。这是最硬的基本功。

这部书“寻”的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灵魂。说起来也许并不深奥,那就是一切让事实说话。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究竟有多少作者做到了呢!许多人动辄指责作者屈服于市场压力或者经济利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思维方式的感性成分与悟性成分非常发达,而理性成分与逻辑思维相对弱化。许多自称知识分子的朋友激情充沛甚至汪洋恣肆,特别是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靠激情催旺文字,自诩道德优势,喜欢居高临下地训导读者,文字表达上煽情重于说理,高屋建瓴多于无声润物,天马行空的想象远远超出一是一,二是二的如实记述,再加上动不动的反诘名



《追寻轨迹 1959~2009——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变革求新发展之路》,李浩鸣、邓晓丽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定价:60.00元

式,即使理由不充分也能把文章做得风生水起,读者往往也缺乏冷静和耐心,有意无意地跟着感觉走,导致许多问题缺乏相互尊重的讨论气氛。

正是《追寻轨迹》体现的这种朴实无华的“追”与“寻”形成作者独特的文体意识。以我的经验忖度,这亦与作者的经历与学识密切相关。李浩鸣先生是一位自然科学研究出身的学者,曾跟随创立地洼学说而与李四光先生齐名的大地构造学家陈国达院士,从事地球科学与成矿学科研究工作,养成凡事认真的研究态度。而立之年后因兴趣使然,离开科研管理而从事科技新闻,一千就是20多年,知天命之年后又放弃媒体领导职务,重开风景线,在岳麓山的“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办学授徒。邓晓丽就是其得意弟子之一。据李浩鸣先生讲,他之所以决定写这部书,是将自己的三个情结融为一体,那就是研究情结、新闻情结与科技企业情结。这仅仅从行文之间即能感觉得到。有的章节紧锣密鼓,甚至让你间不容发,连气也喘不得喘上一口,有的章节则柔板轻弦,让你悠然恬淡若有若无。这一紧一慢,一动一静,既规定了叙事的路径,也调适了叙述的节奏。而这紧张慢之叙,动静之间,又不是均衡用力,而是错落有致,一路叙说下来,叮当有声,仪态万方。让我们自启净化之际又得到美的享受。

《追寻轨迹》一书的优点多多,自然使读者有独特的阅读快感,而我看重的,却在这上头,读者或许以为我饶舌呢。至于书中写活的那些雄才大略者,不必由我臧否,还是读原著为宜。

□陈洁

幽默艺术家方成,在他91岁高龄之际,以汉英对照的形式推出了他的又一部著作《幽默艺术》。这位从事幽默艺术创作六十多年的老人,且不说他在当今中国漫画界、杂文界、曲艺界的元老地位,即就他三十多年来醉心幽默艺术研究所得的成果,早已不下数十种,可谓著作等身。为什么在别人都尽享天年的时候,他还要别出心裁地请人把他的文章逐篇译成英文,推出这部双语版的《幽默艺术》呢?原来他也有苦衷。

“2005年秋,我应邀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幽默艺术的会议,顺便还在费城社区学院和天普大学讲幽默原理。在那些地方会见美国朋友,无法作学术交流。虽然有翻译在,但他们没见过我的英文论著,很难进行讨论,谈不拢。为此我请朋友把我的论文译成英文,寄到美国的漫画杂志上发表。为了便于和国内外的学者们进行交流,就把这些论文、中文的和译成英文的,合在一起,辑之成书出版。”方成说。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自信。当年因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一个发问:“幽默到底是什么?”让他哑口无言,侯宝林接着又说了一句:“咱们都是搞幽默艺术的,中文的和译成英文的。”他便觉得很需要解决。于是他决定去查书研究了,这一钻就是三十多年,成绩斐然。可见他这种迎难而上,不肯服输的性格由来已久。现如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延

首届全国大学生书评大赛获奖作品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王璐

易中天品的三国为什么那么红?《明朝那些事儿》为什么那么火?《亮剑》、《红日》的收视率为什么那么高?

因为他们所讲所写所展示的人物很丰满。他们不仅告诉我们这些人物的想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且还告诉了我们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们为什么会按照他们想的那样去想,为什么会按照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

所有的人都处在社会之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而社会学就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试图解答以下这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按照我们想的那样去想呢?我们为什么会按照我们做的那样去做呢?”

《社会学的邀请》是由美国教授乔恩·威特写的,是一本有关社会学的大众普及类读物。本书都是以日常生活和著名的电影为切入点,带领读者进入生活这后台幕,看看隐藏在生活背后的东西。他把社会学这个来源于现实生活、重新还原于生活,让读者通过社会学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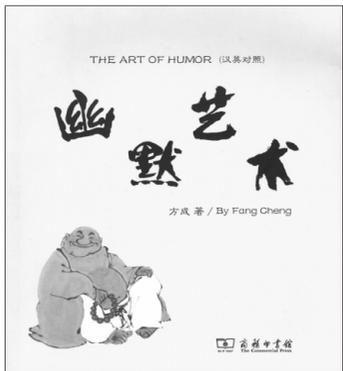
坚持“走出去”的幽默艺术家

伸发展又给他提出了新的课题,他再次自谋生路,努力让自己的幽默艺术研究突围出去,跟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对话。

根据方成的系统研究,幽默艺术作为社会文明进步和语言进化的产物,不为一国所独有,而是各国相通的。正因如此,人们发现中外幽默艺术有共同的特点,比如曲折含蓄,又如奇巧有趣;人们在运用幽默艺术时也不乏共同的技巧,比如讽刺、双关、夸张、比喻等;它们可以发挥相似的效应,既是一些文艺作品的灵魂,也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但是毕竟中外幽默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不尽相同,如果等而论之,不从文化和语言背景上去深入理解,轻则蒙在鼓里,重则还会闹出大笑话。正像书中一幅漫画所讽刺的,一个中国人嘲笑身边走过的外国男士穿着印有“同仁堂乌鸡白凤丸”字样的上衣,而他自己的上衣胸前却堂而皇之地印着美国的休闲鞋品牌“Camel”。在运用别国语言开玩笑时,尤其要慎重。美国人特鲁·赫伯写的《幽默的艺术》一书中提到,一位擅用多国语言的著名演说家在波多黎各西班牙语演讲,正说到一个6岁女孩被羞辱,不知为何引起在座的哄堂大笑。原来当地西班牙语“羞辱”一词还当“怀孕”的粗话来讲。由

此可见,中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不仅仅在于发掘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更在于展示各自的特性,从而在交往过程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幽默艺术》一书的贡献突出表现在通过幽默艺术的交流平台,系统展示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幽默实例,有助于外国人切实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内涵。在探讨幽默的特色时,方成举出“寓庄于谐”的特点,像漫画总是习惯于对社会上不合理、不合法、不道德的事物现象及人物进行评议和夸张的表现。这种讽刺画在西方也有一些,而在中国迅速发展,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因为它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十分吻合,正像让·诺安《笑的历史》中所引述的“西方人善于表情严肃地表达幽默,而中国人则善于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中国人有一种稳重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是以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广博见识为基础的。”方成在详述幽默技巧时,认为谐音和俏皮话独具中国的语言特色。谐音充分反映出汉语同音字多的现象,如把催眠上选的“向前看”改成谐音的“向钱看”,



《幽默艺术》,方成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11月出版,定价:24.00元

立刻成了讥讽人贪财的话;沈天呈的漫画“有礼走遍天下”巧妙用俗语“有理走遍天下”,对走后门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俏皮话则是前半句起兴,后半句落到实处,前言一搭后语,让人发出会心的笑声,颇具巧力。所举例子很多,如“狗掀帘子——净仗着嘴”,充满奇趣。

面对长期以来“幽默源自英国”的说法和“中国人幽默吗?”的质疑,要想申明中国的幽默艺术由来已久,他找到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就有关于优旃、东方朔等

人搞笑的记载,进而表示“中国人应该是很理解幽默的,因为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有形成幽默语言的条件”。但是毋庸讳言,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专制体制下,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用文字表达幽默很危险,所以流传下来的幽默文学作品很少。相对而言,中国的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成为幽默艺术繁衍发展、生生不息的深厚土壤,他在《中国的俗话和谚语》、《笑谈种种》、《老百姓的幽默》里广泛列举了古往今来的幽默实例。

这本书越往后读,越为方成老先生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为了让中国的幽默艺术研究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站到同一个舞台上,共同印证这种艺术形式的特色所在和发展历程,他脚踏实地地付出努力,推出双语著作,堪称有益的尝试。将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对照出版,无论对于国外幽默艺术研究的同行,还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曲艺的外国留学生或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者都是十分便利的文本形式,特别是就其研究和参证的准确性、有效性而言,较之单一语种会更胜一筹。

近年来,国家极力提倡对外文化交流以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令人遗憾的是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仍没有显著的改观,众多科研院所的中青年学者因为物色不到合适的英译者,或落实不了翻译资金,而在图书“走出去”的门槛外徘徊踟蹰之时,方老先生已经身体力行,做出了表率。

理解我们的社会



《社会学的邀请》,[美]乔恩·威特著,林聚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定价:40.00元

行动对他人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人与他人的关联度越多,他就越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和约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原来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虽然潜移默化,但是强度却如此之大。

年轻的我们,基本没有谈论过“社会阶级”这个词语。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教育我们,知识改变命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所有的孩子都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只要努力学习,就可以改变命运。

吃得苦中苦,难道真的就可以成为人上人吗?很遗憾,这个命题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在本书中,作者列举了几项研究结果。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会影响到子女;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在整个学习阶段,比那些母亲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孩子表现更出色。”每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同,它们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也不同。出生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孩子,“带着不同的文化资源和谐如语言技巧、阅读技巧、知识经验等支持条件进入学校,这从一开始就影响了他们的成绩”。当然不排除有的人虽然家境贫寒,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不过对整个社会来看,这只是少数的少数。

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我们认识到社会对我们个人的束缚。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是让人们都成为宿命论者,放弃改变社会阶级的努力,而只是让读者认识到这个社会现实。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理想和现实还是存在着很大差距,不仅中国如此,美国如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只有认识到这样不公平的现实存在,才有可能促进社会的改良,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加公平。改良社会学的目标就是比较社会现实与社会理想的差距,进而改良

社会。

就个人而言,认识到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与束缚有利于减少内心的困惑与焦虑。当勤奋学习,但是学习成绩仍然不如另外一些不太努力的同学时,如果从你们不同的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中寻找原因,反而容易理解并获得释然。当雇主雇佣了各方面能力均不如你的竞争对手时,不妨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思考,也许雇主想要的是这位应聘者的社会资源,也就是人脉资源。想要成功一定需要付出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没有困惑和遗憾,人生自然也就更容易获得快乐。

我一直在想,孔子之所以“六十而耳顺”,也许就是认识到了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和束缚,知道周围的人和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这么做,因此看待周围的事物和自己的命运也就没有什么困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内心获得了安宁,自然也就“耳顺”了。

社会学虽然不是“显学”,没有很多人追捧,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说自然科学为自然界的现象提供了基于经验和理性的解释,那社会学就是为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中的现象提供了一套解释,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这个社会。(本文获三等奖)